

史海探源

19世纪后半期澳洲排华运动与 澳大利亚联邦运动

王宇博

(江苏教育学院 历史系, 江苏 南京 210013)

[关键词] 联邦运动; 种族主义; 经济利益; 华工; 排华运动; 澳大利亚

[摘要] 19世纪后半期, 利益的接近与趋同导致在以英国移民及其后裔为主体的澳大利亚白人之间逐渐形成了愈加明确的民族认同感, 进而导致澳大利亚民族国家——澳大利亚联邦的建立, 这一演进过程就是澳大利亚联邦运动。而与此相伴随的澳洲排华运动则加速了澳洲各地白人之间的联系与联合, 加剧了澳大利亚各殖民地与英国之间的分离并成为联邦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图分类号] D634.36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162(2004)02-0045-08

Australian Federation Movement and the Exclusion Movement against the Chinese during the Late 19th Century

WANG Yu-bo

(Department of History, Jiangsu Institute of Education, Nanjing 210013, China)

Key words: The Australian Federation Movement; racism; economic benefits; Chinese labour; the exclusion movement against the Chinese; Australia

Abstract: During the later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the similar interests and benefits gradually brought about a sense of national identity among the white Australians of the British origin, and finally resulted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ational state of Australia—the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This process of evolution was characterized as the Australian Federation Movement. The deepening connection and alliance among the white Australians that quickened the separation between the Australian colony and the Great Britain, while the exclusion movement against the Chinese immigrants in Australia formed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Federation Movement and had its profound influence.

19世纪后半期是澳大利亚民族与民族国家生成的重要时期, 其主要表现为澳洲人的联合, 这一联合的形成过程又是一场在自然状态下演进的社会运动, 即联邦运动。而澳洲社会弥漫着以

[收稿日期] 2003-10-08

[作者简介] 王宇博 (1960-), 男, 甘肃天水人, 江苏教育学院历史系教授, 历史学博士, 主要从事澳大利亚现代化问题研究, 著有《澳大利亚——在移植中再造》。

“白人优越论”为基调的“白澳”意识，使得此时受经济利益吸引而进入澳洲的华人遭遇到几乎是所有澳洲白人的敌视与排斥，因而，澳洲白人发动的排华运动逐渐由分散发展到各地区合作，再升级为全澳联合。因此，综观这一时期的澳洲，可以越发清楚地看出：排华运动的运作不仅与联邦运动的推进是同步的，而且排华运动是联邦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

“白澳”意识是近代澳大利亚民族意识中的重要内容之一，表现为在澳大利亚民族形成的过程中，英国移民对来自非欧美国家和地区移民的歧视态度。虽然在澳大利亚民族意识中充满了自由、平等、民主等内容，但这一切仅局限于以白人移民，甚至只是以英国移民为主体的“白人澳大利亚”。这使澳洲社会与正在形成中的澳大利亚民族背负着浓厚的民族偏见和种族色彩，响亮的民族主义口号——“澳大利亚是澳大利亚人的澳大利亚”，实际上充满了狭隘的种族主义气息：“澳大利亚是白种人的澳大利亚”。

“白澳”意识的产生和盛行是西方种族主义思潮在澳大利亚社会中的反应。它早在 19 世纪 40 年代就显露端倪。其产生的原因在于：其一，英国移民及其后代中的母国情结使“白澳”意识成为维系澳大利亚民族与英吉利民族密切联系的感情和血缘纽带，因此，英国移民担心有色人种的进入以及由此造成的通婚和融合会导致血统混乱，进而影响英吉利民族血统的“纯洁性”，不愿意澳大利亚成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其二是着眼于经济利益，惟恐其他民族和人种移民的进入会使英国移民的就业机会减少，生活水平下降。从 19 世纪中期开始，“白澳”意识随着种族偏见的加深而系统化和理论化，首先是它在加大赞美澳大利亚是一块圣洁的乐土的同时，害怕有色人种的进入会带来新的社会问题，如种族问题和民族矛盾。一些政客鼓噪：澳大利亚是“建立在一个摆脱了压迫和奴役的、没有等级的社会理想上的。……压迫和奴役则是古老国家所特有而新大陆也未尝幸免的东西”，因此，有色人种的进入“就意味着澳大利亚文明和社会结构的毁灭”。^[1]其次，澳大利亚白人（特别是白人劳工）视有色人种的进入如“鸠占鹊巢”，认为有色人种移民和廉价劳工是对他们经济利益的威胁。

在“白澳”意识的驱动下，将“劣等民族”一概拒之门外的办法是“最好的防范手段”，成为澳大利亚社会的“共识”。在澳大利亚颇有影响的《新闻公报》喊出了一句获得社会共鸣的口号：“澳大利亚是澳大利亚人的——贱货支那人、贱货黑鬼和贱货欧洲瘡三一律滚开。”一位政客撰文解释：“就澳大利亚一词而言，我们不认为仅是那些出生于澳大利亚的人，所有登上这里海岸的白人都是澳大利亚人。——黑人、中国人、印度人以及廉价的有色人种劳工则不是澳大利亚人。”^[2]换言之，虽然这些分散在澳洲大陆上的白人之间存在着许多矛盾与纷争，但是，在排斥有色人种问题上，他们则具有一致性。在 19 世纪后半期，在对待中国移民（即华工）问题上，这种一致性不仅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而且成为引导白人走向合作和联合的重要动力之一。

二

早在 1783 年，当英国政府正在商讨如何开发和使用澳大利亚时，就有人倡议把中国苦力输入澳大利亚。1829 年，鉴于澳大利亚牧羊业的发展和劳动力的奇缺，英国殖民地改革家 E·威克菲尔德曾主张雇佣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亚洲人和太平洋岛国上的土著人作为契约工人运入澳大利亚。^[3]而据说第一批运到澳大利亚的中国人是新南威尔士于 1848 年接受的来自中国厦门的 100 个成年人和 20 个男童。另一批 270 个中国人于 1849 年装船运出。1852 年，驻厦门的英国领事报告说，已经有 2666 位中国人被运往澳大利亚，其中 1438 人是在 1851 年间运出的。^[4]这些华人大都以契约苦力的身份就业于牧场和农场，虽然这些华人体力不强，多有被白人不能接受的陋习，但是，澳洲的牧场主和农场主对雇佣华人等有色人种劳工还是颇有兴趣，白人与华人之间基本上

相安无事。

然而，1851年开始的澳洲“淘金热”则改变了这种情形。在黄金的吸引下，在澳大利亚做工的契约苦力不顾雇主的百般挽留，纷纷奔向金矿。这种情况严重到了在1852年的新南威尔士立法会议上，作为悉尼代表的新南威尔士政治家W·温特沃斯提出修改金矿场地管理法案的议案，以便拒绝向未经雇主辞退的华人发放淘金许可证。由于淘矿急需劳工等因素，这个提案被否决。^[5]而接着发生的是，“淘金热”吸引了来自中国福建和广东地区的成千上万的华人，以致在澳华人数迅速增长。以维多利亚为例，在其1854年第一次人口调查记录内只有2341位华人，到1855年初，华人数则达到了1万人，再到1855年年中达到1.7万人。其中几乎全是成年男子。^[6]这些成群结队涌进澳大利亚的中国人“以为英国人是很友好”的，他们把位于金矿区的墨尔本称为“新金山”，相对于美国加利福尼亚的“旧金山”。1858-1859年，在澳华人数达4.2万人。^[7]在当时澳大利亚各地的人口比例中，在维多利亚，中国人为4.56%，在新南威尔士为3.63%；而在金矿区的劳工人数量比例中，华人矿工占总矿工数的18-24.5%。特别是在较为贫瘠的矿区，华人劳工的数量超过了白人劳工的数量。^[8]

在澳华人移民的共同理想是在发财致富后衣锦还乡，荣归故里。他们相同的愿望是“叶落归根”，渴望与家人团圆和在故乡安度晚年。这种传统观念使在澳华人不去追求冒险和享乐，而是默默劳作，克勤克俭。因势单力薄和缺乏技术等原因，华人通常不与白人直接竞争。他们往往是4至6人一组，主要在白人废弃的矿井里淘金，在“淘金热”中，大多数华人是“与世无争地在别人采过的金矿里挖掘矿渣”。所以，他们被白人蔑称为“挖渣滓的家伙”、“跟踪者”。而那些受雇于白人的华人的工资也仅及白人矿工工资的一半。^[9]为了攒积钱财，他们省吃俭用，过着十分贫寒和简陋的生活。南澳大利亚总理在谈及华人生活时说道：“他们的生活方式，使他们能在使欧洲人家庭挨饿的地方生活并存钱。”^[10]尽管如此，在“淘金热”中，华人因手中的财富可观而成为一股不可低估的竞争势力。1851-1861年间，澳大利亚的黄金产量约占同期世界黄金总产量的40%，时值约1.24亿英镑，其中维多利亚的产量居各地之首，约值1.1亿英镑。而在1854-1870年间，有价值3531956英镑的886065盎司的黄金和价值560627英镑的黄金制品从维多利亚输往中国。仅在1856年，就有116903盎司和价值50万英镑的黄金“流到广州”^[11]。

对黄金的渴望使白人矿工对华人手中的财富垂涎三尺，对华人倍感嫉妒，由此而导致的白人矿工仗势欺人，驱赶、劫掠、殴打华人的案件和事件与日俱增，殖民地当局则屡屡予以偏袒。1854年，维多利亚本迪戈金矿的白人矿工举行大会，决定在7月4日对矿区的华人发动袭击，企图将华人全部赶出该金矿区。幸而当局及时干预而未酿成严重事件。但是，此事则拉开了澳大利亚有组织和有规模排华的序幕。

事后不久，维多利亚当局组织了“金矿皇家委员会”，着手调查和处理这类纠纷。在该委员会动议下，1855年6月，维多利亚议会通过一项旨在排华的法案——《为某些入境移民做出的规定》，规定凡经登记的船只，每10吨位准载华人1名，并且每1名入境华人须交入境人头税10英镑。这是澳大利亚历史上的第一个排华立法。这一法案的关键之处在于它为澳大利亚其他殖民地树立了一个以立法手段排华的先例。

白人矿工因此而大受鼓舞，更加肆无忌惮，排华活动逐步由个体的事件发展成为大规模的运动，并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1857年7月4日，在维多利亚巴克兰河金矿区，爆发了白人矿工大规模袭击华人的恶性事件，有3名华人当场死亡，2000多华人遭遇抢劫，华人的财产损失达5万英镑。而维多利亚当局不仅任凭白人暴徒逍遥法外，听任他们拉帮结派，在次日竟成立了澳大利亚历史上的第一个排华组织——“维多利亚矿工反华联盟”，而且还在事后不久，向华人开征居留税，凡12岁以上的华人每人每月须缴纳1英镑。后经华人的集体请愿，“祈求议会为贫民设想，免除此税”，1859年2月，维多利亚议会才将征收标准改为每人每年4英镑。^[12]

为了达到将华人排斥于澳洲之外的目的，维多利亚向其他殖民地多次发出共同排华的呼吁。虽然各地澳大利亚人之间矛盾重重，难有一致之处，但是在排华问题上，他们则很容易就达成了一致。南澳大利亚率先响应。1857年，南澳大利亚议会通过了一项以维多利亚排华法案为蓝本而制定的限制华人入境法案。

在1856年3月新南威尔士的人口调查统计中，华人仅为1806人，因此，当局未将此事予以重视。而在其后，在维多利亚和南澳大利亚遭遇排斥的华人纷纷转道流向新南威尔士，在1861年的新南威尔士人口调查统计中，华人已达12986人。^[13]与此同时，白人与华人之间的冲突事件也时常发生。1860年12月12日，在新南威尔士蓝滨滩发生了白人袭击华人事件，华人死亡2人，伤10人。此后，暴力排华事件在这里也逐步蔓延。次年9月，有数千华人在光天化日下被白人打劫，甚至连白人妇女和儿童也趁火打劫。对此，新南威尔士当局非但未予弹压白人，反而在1861年通过一项与维多利亚相同的法案，以排华的方式来平息事端。

这三处殖民地的排华运动产生了成效，不仅成功地拦阻了华人的涌入，而且还迫使许多华人离境，使得在澳华人数量陡减。1861年时，居留在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的华人分别是12988人和24732人；而时至1871年，该数量则为7220人和17826人。^[14]此外，“淘金热”由盛转衰，矿工们纷纷转业，白人矿工与华人的冲突也随之减少。因此，这些排华法案基本上已经失去了继续执行的必要，于是，在1861-1867年间，三地议会先后各自废除了排华法案。第一次排华运动平息。

19世纪五六十年代澳大利亚各地的排华运动表现为各自为政，联系甚微，仅局限于简单地呼吁和在具体问题上的谈判，如，在1857年，维多利亚当局为了谋求制止华人从陆路绕道进入维多利亚的办法而同新南威尔士和南澳大利亚进行了谈判。这种状况与当时澳大利亚分散的政治与社会格局是相吻合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各地白人彼此之间矛盾重重，勾心斗角，但在排华问题上，他们的一致性则是在其他问题上所没有出现的。

三

澳大利亚学者们在研究19世纪后期澳大利亚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以及联邦运动的酝酿与运作时都着重提出和罗列澳大利亚人的合作与联合问题，但是，尽管他们都提及了排华问题，但大都将其置于次要位置。然而，在以白人为主体的澳大利亚民族的形成过程中，“白澳”意识所起的作用就是巨大的民族聚合与凝聚，它具体而明显的表现则显示在排华运动中。而在同样以白人为主体的联邦运动中，各地澳大利亚人的合作与联合也是开始于在排华问题上的观念上的共识与行为上的一致。

在1875年以前，当其他地区的排华运动风起云涌时，缺乏劳动力的昆士兰不但置身事外，而且对使用低工资的有色人种劳工颇感兴趣。1874年，代表种植园主利益的人还试图说服当局试探从中国厦门引进中国劳工。有些种植园主甚至自己径直到中国去招工。然而，在1875年，在昆士兰帕尔墨河发现金矿，华人随之蜂拥而至，并且收益丰厚。“据估计，那时白人掏取黄金有一百三十万盎司，华人亦有一百万盎司。”^[15]这立即招惹来白人的嫉妒，于是，第二次排华运动呼啸而来，昆士兰执其牛耳。1875年，昆士兰殖民当局向香港殖民当局提议拘留所有驶往昆士兰的船只，以图断绝广东华人赴昆士兰的源头。1876年年底，昆士兰议会通过金矿区管理条例，对华人征收大大高于白人的采金执照税。与此同时，昆士兰殖民当局还以退还税金为诱饵，鼓励华人回国。可是，这个方案在英国遭遇否决。

对此，昆士兰一片哗然，人们认为这是其内政，强调英国此举违反了自治原则。于是，他们采取了更为强硬的做法。1877年，昆士兰议会正式通过《限制华人移民法案》。同时，昆士兰当局和社会在全澳寻求支持，并立刻得到了积极的响应。在各地的响应举措中，1880年澳大利亚

殖民地联席会议的召开是最具有意义和影响的，它标志着排华运动成为了澳洲白人的联合行动。换言之，如果说澳大利亚联邦运动的过程是澳大利亚逐步走向联合的过程的话，排华运动则成为这场运动的先导部分。

虽然这次联席会议涉及多种议题，但各地代表仅在排华问题上取得了共识。在会议上，会议主席、新南威尔士政府总理 H 帕克斯呼吁各殖民地采取联合行动，遏制由华人引起的社会问题。代表们以维护“澳大利亚人的利益”为宗旨，一致通过排华决议。从 1880 年到 1888 年，在各殖民地，排华措施和法案层出不穷，进而构成了一个旨在排华和覆盖全澳的封闭体系。^[16]

进入 1880 年代以来，排华运动愈加显示出是联邦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表现在排华与反华问题上，各地的澳大利亚白人以整体认同的形式取得了意识上的共识与行动上的一致，澳大利亚白人开始以自然的演进形式从合作走向联合。

首先，排斥华人的种族主义思潮在澳洲日益盛行，丑化华人的谣言甚嚣尘上。这一切逐步形成一种具有号召力的政治鼓动，表现为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排斥。中国人被视为劣等民族，被形容为个个都吸食鸦片，男盗女娼，其服装、外形、语言和宗教信仰都成为了被白人们侮辱的对象。在城市里，华人居住区被看作是污染源，一旦出现传染病流行，华人必定遭遇无端攻击。^[17]当白人看到在澳华人中妇女仅占 2 - 4 % 时，他们惊恐地预言：这会导致华人与白人的混血，打破澳大利亚的白人血统。其实，这纯属危言耸听，造成在澳华人这种结构的原因是：他们并无意在澳大利亚安家立业，仅是打算为养家而在此挣钱而已，因此，没有带妻子同行的必要。况且，他们也都无力为妻子支付赴澳路费。再有，绝大多数在澳华人财力不济，难以融入高于华人消费标准和承受能力的澳大利亚社会，迎娶白人妇女为妻更是天方夜谈。^[18]

其次，进入 1880 年代后，白人与华人之间的冲突有增无减，因此，利益的趋同使白人在排华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共同点，使排华越发成为他们的一种必须采取的行动。在“淘金热”后，当许多白人矿工还在为失业而苦恼时，华人矿工则迅速转行，大量进入城市。“在每一个谋生领域，……华人似乎普遍都能适应”。在诸多行业中，他们以机敏、廉价和高效而受到白人雇主和顾客的青睐，并对白人同行构成了威胁，“华人……的成功引起了羡慕和反对”，白人们惊呼“华人竞争”。家具制造业是当时华人工匠与白人工人竞争最激烈的行业之一。在这个行业中，尽管白人的从业人员数倍于华人，但是，华人仍占有明显优势，长期处于生意兴旺发达的状态。在 1880 - 90 年代，当白人的家具生产经营因缺乏市场而不景气时，“华人的产品已分配到墨尔本以至维多利亚乡镇的各大家具货栈和商店中去，顾客来自欧洲人的各个阶级。”^[19]这使经营家具的白人工人相形见绌，望尘莫及，于是，他们纠集在一起，组建了“家具制造业反华联盟”，再度依靠人数优势和政府偏袒，运用非竞争手段来打压华人。而类似的竞争在澳大利亚各地的众多行业中多有出现。^[20]此外，在社会上和政界里，保护关税主义者也发现排华的目的与他们要保护澳洲经济利益和澳洲人就业的宗旨是一致的。

再者，排华运动愈加从一个侧面显示出澳大利亚民族国家的形成。虽然时至 1880 年代，澳大利亚仍是英国的殖民地，但是，澳大利亚人的国家意识则在逐步增强。在排华问题上，这种现象初见端倪。白人仇视华人的更深层次的原因是预感到来自中国的威胁。“中国被视为具有掀起大规模移民潮的来源”，^[21]这使白人大有华人“和平入侵”的恐惧感。一些政客分析：“澳大利亚人烟稀少，又是一块潜在的富裕之地。因此，处于邻近地理位置的中国把澳大利亚作为解决他们国家贫困而人口又过于拥挤的安全阀来使用。”^[22]此外，这一时期中国政界中“洋务派”的宣传和中国政府加强国防与军备的举措更使澳大利亚的白人想入非非，帕克斯曾危言耸听：“我不由得不认为，中国政府支持了目前的中国人进入（澳洲）的运动。……其目的是为了组建中国的殖民地。”^[23]1888 年 3 月 7 日的《悉尼先驱晨报》声称：“中国可能派遣军舰来澳洲并令陆战队在澳洲北部登陆。”^[24]他们的这种感受愈加明显地是建立“在一个国家的基础上，而不是帝国的基础

上”。通过他们的言行，可以隐约领悟到此时各地澳大利亚人的利益已经不是局限于自己生活的澳洲一隅，而是与全澳洲的领土与疆界相联。

排华运动源于以英国移民为主体的澳洲白人在利益上的相近和趋同，而运动的进行与蔓延又使他们愈加将澳洲大陆当作了共同所有的疆域，促使原本不相往来的各地白人为了自身需要而增进了交往，促进了散居澳洲各地的白人群体逐步结合成为一个整体的澳大利亚民族与民族国家。正是通过排华运动，澳大利亚民族和民族国家的概念以逐渐脱胎于英吉利民族和英国的形式而越来越清晰地显示出来。维多利亚政治家、澳大利亚联邦第二任总理、“白澳政策”的始作俑者 A·迪金曾做过具有代表性的表述：“个人或国家最基本的本能——自我求生的本能——因为处在生死关头的正是国家尊严、国家性质和国家前途。以前，人为的而且带有任意的政治划分曾把我们分离开来，要消除这种划分，没有别的动力能比下述愿望起到更广泛的更强有力的作用。这种愿望就是：我们应该是一个民族，而且永远是一个民族，没有其他种族的掺杂。”^[25]

如果说联邦运动的进程表现为澳洲的联合和在联合基础上的国家形成的话，那么，排华运动则最为明确地表现出了联邦运动的运作轨迹：在 1880 年代以前，利益的驱动使白人的排华活动由分散发展为白人的合作；而 1880 年代后，特别是从 1880 年代后期起，排华活动则显示为由合作演进为白人的联合和澳洲的统一，其过程为从 1888 年澳洲 6 个殖民地一致通过排华动议到 1897 年各殖民地以《纳塔尔法案》来限制华人和 1901 年澳大利亚联邦颁布的《移民限制法案》；从作为民族意识和社会道德概念的“白澳意识”进而促成作为国家政策的“白澳政策”的确立。可见，在形式上，排华运动的发展和升级的过程与澳洲的统一和澳大利亚民族形成的进程是同步相伴的；在实质上，前者是后者的组成部分之一。

四

澳洲的排华在导致澳洲各地利益趋同和促使澳洲白人走向联合的同时，也加深了澳大利亚各殖民地与英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在 19 世纪，虽然在对待与英国的事务与关系上，澳洲各殖民地基本上是各不相同，各自为政，即使各地之间有合作，大也都仅是双边或三边等，而从未出现过各殖民地相互呼应和联合一致的现象，然而，在对待华人问题上，则出现了澳洲各地白人为了抵制英国的既定政策而联合一致和共同行动的现象。这种联合是澳洲利益与帝国利益冲突的表现之一。

英国政府对澳洲的排华运动颇为不赞同，因为对于英国而言，这是一个对英国与英帝国具有广泛影响的国际问题。其原因在于：其一，英国政府与清政府签订过允许华人不受限制地进入英属领地的条约。在 1860 年 10 月订立的《北京条约》中，英国政府允诺：“以凡有华民情甘出口，或在英国所属各处，或在外洋别地承工，俱准与英民立约为凭，无论单身或携带家属一并赴通商各口，下英国船只，毫无禁阻。”^[26]其二，澳洲排华运动的最终目的是确保白种人的“纯洁”，进而在澳洲构筑“白色城墙”，建立“白色的澳大利亚”。这一系列行为符合澳大利亚人的意识与利益，但却与英国的“帝国理念”与“帝国利益”相悖，因为英帝国是一个包括了大量有色人种的大帝国，因此，虽然英国人的种族主义意识毫不逊色于澳大利亚人，但是，为了帝国的联合，英国人不会赞同或放纵澳大利亚人对有色人种的所作所为。其三，近代以来，英国与亚太地区（特别是远东地区）国家的交往逐步增多，在中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国成为“唯一在远东拥有较大利益的欧洲强国”。^[27]自 19 世纪中期以来，面对西方列强在远东地区的渗透与竞争，旨在维护既得利益的英国力主维持远东的“现状”。由于直到甲午战争爆发，中国一直被国际社会公认为当时亚太地区国力最强的国家，因此，英国将清政府当作其远东政策执行过程中一个颇有份量的筹码，^[28]这使得英国政府不会漠视清政府就澳大利亚人的排华所提出的抗议。所以，凡此种种，英国政府不会任凭其属地上的臣民在将会有损英帝国利益的情况下为所欲为。可是，此时的

澳大利亚白人则已将澳洲的利益置于“帝国利益”之上，甚至将“帝国利益”置于对立面。因而，华人问题逐步成为澳英之间的利益冲突点之一，以致澳洲的自治呼声更加高涨，分离倾向更加明显。

1876年昆士兰的金矿区管理条例使澳英之间的这种矛盾冲突公开化与白炽化。对于该条例，英国政府予以否决，并要求昆士兰政府对此进行修改。英国殖民大臣卡那文伯爵致函昆士兰政府，提出两条修改意见：“第一，……使之不致于成为直接专限对付英帝国某一友好国家人民的法律。英帝国正谋促进与这些国家的自由往来关系。第二，……使之不致成为损害英帝国内亚洲与非洲两处属地人民利益的法律”。^[29]然而，昆士兰的反应却是强烈的抗拒。它一方面不仅对英国干预其移民政策的做法大加抨击，而且在第二年正式颁布了《限制华人移民法案》；另一方面它呼吁澳洲的其他地区给予支持。针对昆士兰的呼吁，澳洲各地区给予热烈的响应。这一回合冲突的结果是澳洲各英属殖民地不仅没有向宗主国屈就，反而因共同利益所在而加强了合作与联合，澳洲各殖民地驻伦敦总代表就此振振有辞地表示：“如果要我们牺牲在政治和社会平等的原则上改进社会的希望，那我们是在没有做出最认真的努力以避免这样一场灾难之前，甘心这样作的。”^[30]

进入1880年代后，澳洲的排华运动愈演愈烈，其中即是受意识与利益驱动，也包含着对宗主国的抱怨。1888年4月，载有60多位中国人的“阿富汗”号船在墨尔本被拒绝入境，接着又在悉尼被拒绝靠岸，进而酿成所谓的“‘阿富汗’号事件”。不久，深得澳洲社会支持的帕克斯扬言：禁止中国人在新南威尔士的任何一个港口登陆。5月初，澳洲总督卡林顿告诫英国殖民部：中国乘客的任何上岸企图势必遭遇攻击。英国政府出面斡旋，但效果甚微。而帕克斯的气势则甚嚣尘上，声称他“既不顾女王陛下的军舰，也不顾女王陛下派驻的代表，更不顾英国殖民大臣的干预”。5月21日，卡林顿又向殖民部报告：帕克斯已经“孤注一掷了”。英国的驻澳官员也无奈地说道：“我们都被操在殖民地人民手中，只好随他们的意旨办事。”^[31]

由于澳大利亚各责任政府不具有外交处置权，因此，澳洲的排华运动不可避免地涉及到英国，表现为在清政府依据中英之间的有关条约，向英国政府表示其对澳洲的那些“有损中国人”的立法正予以关注的同时，澳大利亚人则要求英国政府能够像美国政府那样，就排斥华人进入澳洲而与清政府进行交涉与谈判，并订立相关条约。^[32]6月，澳洲各殖民责任政府的总理为协调排华事宜而聚首悉尼，旨在促成英国与中国的谈判，帕克斯为此使尽了浑身解数。对此，英国政府先是不理会，接着是拖延，再往后是外交部如此答复殖民部：中国政府无意就在澳华人而与英国签署“美国模式”的条约。而殖民部的意见是：对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外国劳工的限制与排斥的做法是不能够得到来自英国的赞许的，这种限制与排斥势必伤害澳大利亚的贸易。^[33]

英国的态度和做法令只能通过英国才能就移民问题与中国进行交涉的澳大利亚各殖民地大为不满，澳英关系中的对立因素增多，分离倾向加剧。也正是在此次会议上，各位总理就进一步加大限制在澳华人一事而达成一致协议，炮制出更加严厉而苛刻的排华决议：“1. 要求英政府与中国商定移民条约，使其自动禁止华人入澳。2. 要求英政府禁止香港和新加坡两殖民地默许华人入澳。3. 任何船只每500吨限载华人一名入澳。4. 禁止在澳华工从一殖民地进入另一殖民地。”^[34]而最后的结果是，一，作为让步与妥协，澳大利亚将第3条中的500吨改为300吨，英国则接受了第2条；二，就移民问题，英国政府与清政府举行谈判，然而，从所缔结的协议上看，这实际上是一个中英贸易协定，其中的排华内容不仅有限而且勉强。澳大利亚方面对此颇为不满，新南威尔士政府动用立法手段，宣布在新南威尔士终止执行该协议，昆士兰等地的澳大利亚人又一呼百应，闻风而动。

总而言之，澳大利亚联邦运动的运作过程是围绕着具体的澳洲利益而展开的一系列矛盾冲突与冲突升级。纵观这场运动，显而易见，华人问题是其中持续时间最长、波及范围最广和影响力

度最大的矛盾结症与冲突内容。在澳洲，除了政府和政治家在排华运动中摇旗呐喊和兴风作浪、将分道扬镳作为抗议英国政府所为的“口头禅”外，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在工人阶级也愈加将对母国的不满与华人问题联系在一起。“在劳工运动中，分离的话题适合于反帝国与反华的情感。”^[35]在 1880 - 90 年代，伴随着澳洲社会联合程度的提高与“自治”意识的增强，这种社会情绪愈演愈烈，进而越来越明显地构成了联邦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

[注释]

- [1] [3] M. Wilard, *History of the White Australia Policy to 1920*, Melbourne University, 1967, pp. 201 - 210, p. 2.
- [2] M. McKenna, *The Captive Republic*, Cambridge University, 1996, pp. 152 - 153.
- [4] 陈翰笙：《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八辑，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5页。
- [5] 陈翰笙：《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八辑，第6页；M. Wilard, *History of the White Australia Policy to 1920*, p. 19.
- [6] E. M. Andrews, *Australia and China*, Melbourne University, 1985, p. 7; 陈翰笙：《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八辑，第6页。
- [7] *Australian Encyclopedia*, vol. 2, Michigan, 1958, p. 351.
- [8] E. M. Andrews, *Australia and China*, pp. 7 - 8.
- [9] 张秋生：《澳大利亚华侨华人史》，上海：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年，第73页。
- [10] 约翰·根室：《澳新内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39页。
- [11] [12] 沈已尧：《海外排华百年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77、75页。
- [13] [14] 陈翰笙：《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八辑，第8、9页。
- [15] 沈已尧：《海外排华百年史》，第77页。
- [16] 1881年，维多利亚和新南威尔士分别重新修订了限制华人的法案，其中诸多条款更加苛刻。例如，将载客吨位由每10吨限载华人1名修改为每100吨限载华人1名；1884年，昆士兰将载客吨位提至50吨限载华人1名，入境税提高到30英镑；以往对华人未采取任何排斥措施的西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和北领地，也分别于1886年、1887年制订并实施了排华法案。
- [17] L. Trainor, *British Imperialism and Australian Nationalism*, Cambridge, 1994, p. 85.
- [18] 王宇博：《19世纪后半期澳大利亚排华运动探析》，《学术研究》2001年第6期，第139页。
- [19] [20] 杨进发：《新金山——澳大利亚华人，1901 - 1921年》，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58、98页。
- [21] L. Trainor, *British Imperialism and Australian Nationalism*, p. 84.
- [22] H. London, *Non-White Immigration and the "White-Australia Policy"*, Sydney, P. 6.
- [23] L. Trainor, *British Imperialism and Australian Nationalism*, p. 87.
- [24] [25] 张秋生：《澳大利亚华侨华人史》，第131、133页。
- [26]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45页。
- [27] M. H. Bailey, *Britain and World Affairs in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1971, p. 54.
- [28] 参见王宇博：《甲午战争期间赫德与英国远东政策》，《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第139 - 142页。
- [29] 张秋生：《澳大利亚华侨华人谈》，第129页。
- [30] 陈翰笙：《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四辑，第314页。
- [31] 格林伍德：《澳大利亚政治社会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180页。
- [32] 1888年3月13日，美国政府与清政府签订《限制华工条约》，该条约在美国参议院未获通过。其内容参见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533 - 534页。
- [33] L. Trainor, *British Imperialism and Australian Nationalism*, pp. 87-88.
- [34] 张秋生：《澳大利亚华侨华人谈》，第133页。
- [35] L. Trainor, *British Imperialism and Australian Nationalism*, p. 89.